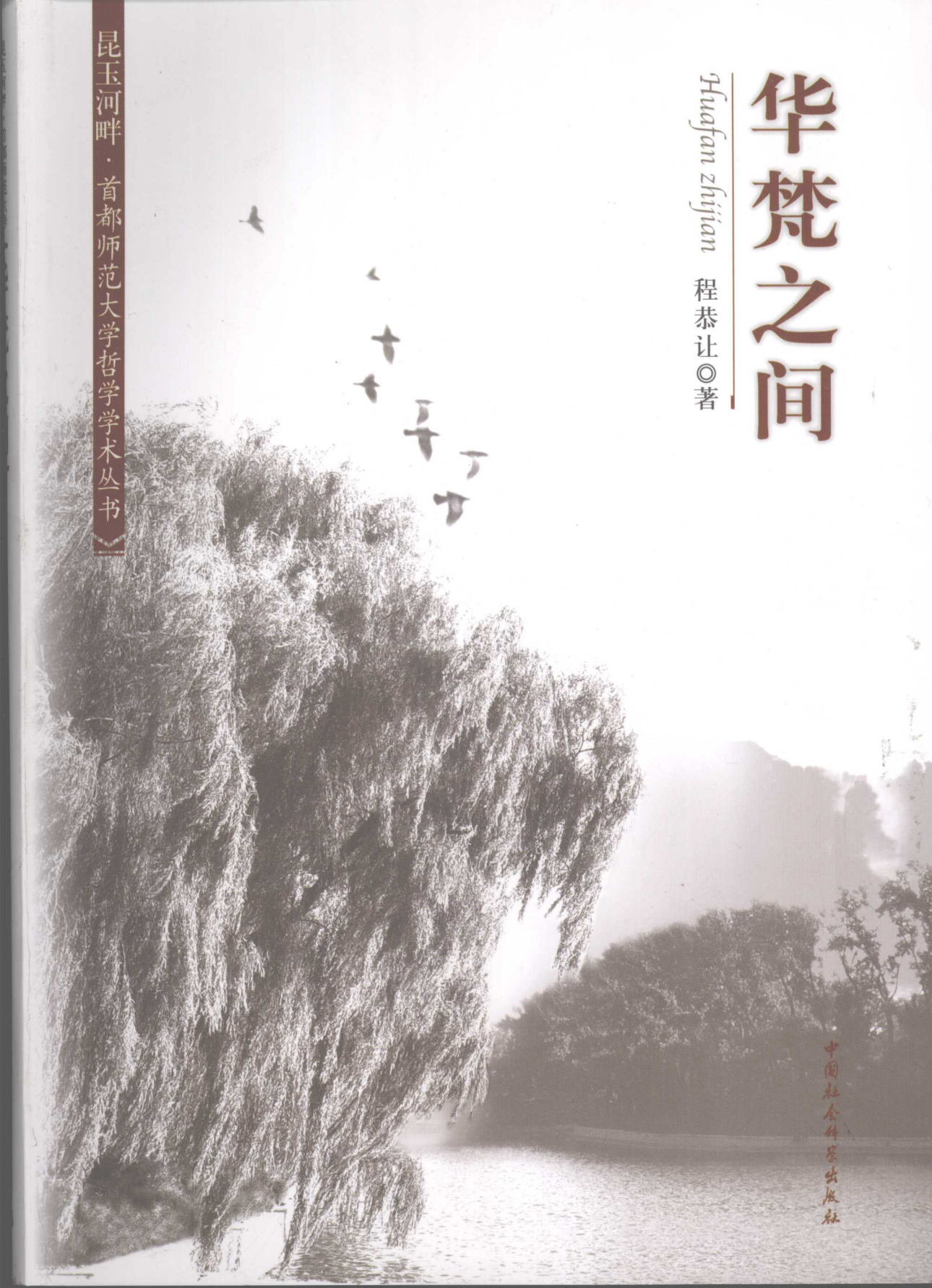


华梵之间

Huafan zhijian 程恭让◎著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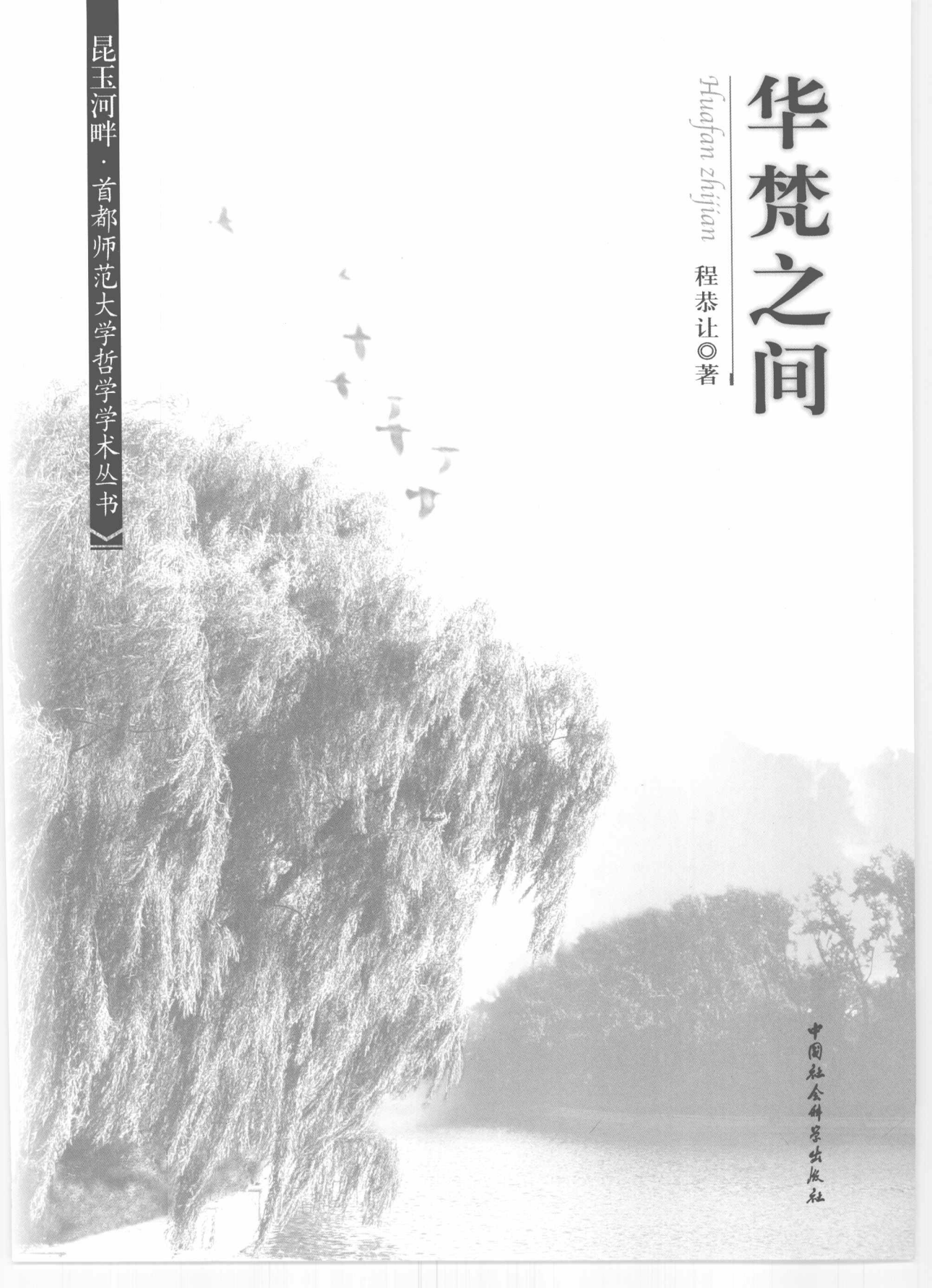
华梵之间

Huafan zhijian

程恭让◎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梵之间/程恭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6746 - 5

I. 华… II. 程… III. 佛教 - 文集 IV. B9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629 号

策 划 任 明 官京蕾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9 插 页 2

字 数 534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如果给哲学以一个意象，那么“水”或许是最自然的选择。无论在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那里，还是在很早的中国哲学著作《管子》那里，“水”都被认为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它是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的“五行”（水、火、木、金、土）和希腊的“四元素”（水、火、土、气）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都是从水中成长起来的。水是文明的源泉，人类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一些大河流域内诞生的。甚且，水是人类借以自我意识的中介，在人类没有发明镜子前，水正是人类从中发现自我形象的自然的镜子。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征，是人类思想和不断再思想的学科。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水被人们和哲学家们所关注，乃至“水”成为最古老的哲学范畴或最古老的哲学范畴之一。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中，神（上帝）创造一切，但却没有创造水。水跟神（上帝）一样地原始。当代科学证明了：地球最宝贵的资源是蔚蓝色的水。假如水资源耗竭殆尽，人类的末日也就真正来临了。换句话说，只要在任何一颗星球上发现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前景，也有了智慧和爱的希望……

我们已经步入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我在地球任一位置上，均可即时寻找到对方的位置。现在我告诉你：中国·北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水资源的匮乏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深切忧患。但是，在两个湖泊——昆明湖和玉渊潭间，流淌着一条这样的河流，她的名字叫做“昆玉河”。我们在昆玉河畔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喧嚣和骚动的闹市中，有一群人沉思着，迷恋着，像昆玉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流淌……

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但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理论却全都没有实际地“终结哲学”。哲学附着并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中。人类具有理性，经常并习惯于思考生活，这就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在哲学所发源的希腊古典时代，人们认定人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认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德性的和理性的生活，认定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性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所谓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万勿过度”，正是这个意思。哲学正是这样

获得了自由、高贵和光荣。如今，哲学应当回到古典精神中去，首先并且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既不仅仅是一种学业，谋取学历和学位；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谋取职务和职称。哲学不是“饭碗”，不是为了“吃饭”所谋求的种种指标体系。而今，献身于哲学事业的人们，尤其应当“在无名中生存”，从权力、金钱和名声的浮躁中解放出来，生活着并且理性地思考着自己的和人类共同的生活。

但是，哲学并不限制于唯一现实的世界，而是开辟了种种可能的世界。哲学是一张比任何地图都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位置不仅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是的，我们正在致力于自我定位的尝试。编选“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宗旨是：弘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成就，系统推出具有一定学术知名度和公共影响力的老中青学者学术代表作，推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研究。丛书采用“昆玉河畔”名称，以便提炼特色，打造品牌。入选书目既包括个人学术自选集，也包括集体学术自选集；既包括学者文库，也包括学生文库，以及学科手册等等。我们计划分3批出版，每批共出版10种。这套丛书正像这条河流一样，映照着我们自己的存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经历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发展。第一代学者的治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史论结合的学风，他们那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教条的思想锐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第二代学者治学，或阐释、或考证、或梳理，其严谨、其细致、其精微，既注意思想资源的开发，又注意当代价值的挖掘，他们这种治学态度，无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时代风气。近几年来，通过人才的引进、整合和培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尤其第三代学者的崛起，必将带来新的前景、新的希望。

当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团队依然处于她的幼年时期，许多成果不够成熟，甚至充满稚气。推出这套丛书，等于一次亮相。但是，序曲已经奏响，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我们期待的是理解、热情和公正的批评。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编委会

2007年4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明代佛教史研究

-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 (3)
- 明世宗“排斥佛教”考述 (24)

第二编 近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

- 以佛学契接康德：梁启超的康德学格义 (41)
- 欧阳竟无先生的生平、事业及其佛教思想的特质 (55)
- 欧阳竟无先生的法相、唯识分宗之说 (102)
- 三时学会清净居士的晚年著作与思想 (143)
- 韩清净居士佛教思想之特质析论 (153)
- 记太虚大师与梁漱溟先生关于人生佛教问题的争辩 (167)
- 周叔迦与《新唯识论》之争 (191)
- 纪念一代佛教文史大家周叔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207)

第三编 梵汉佛教典籍比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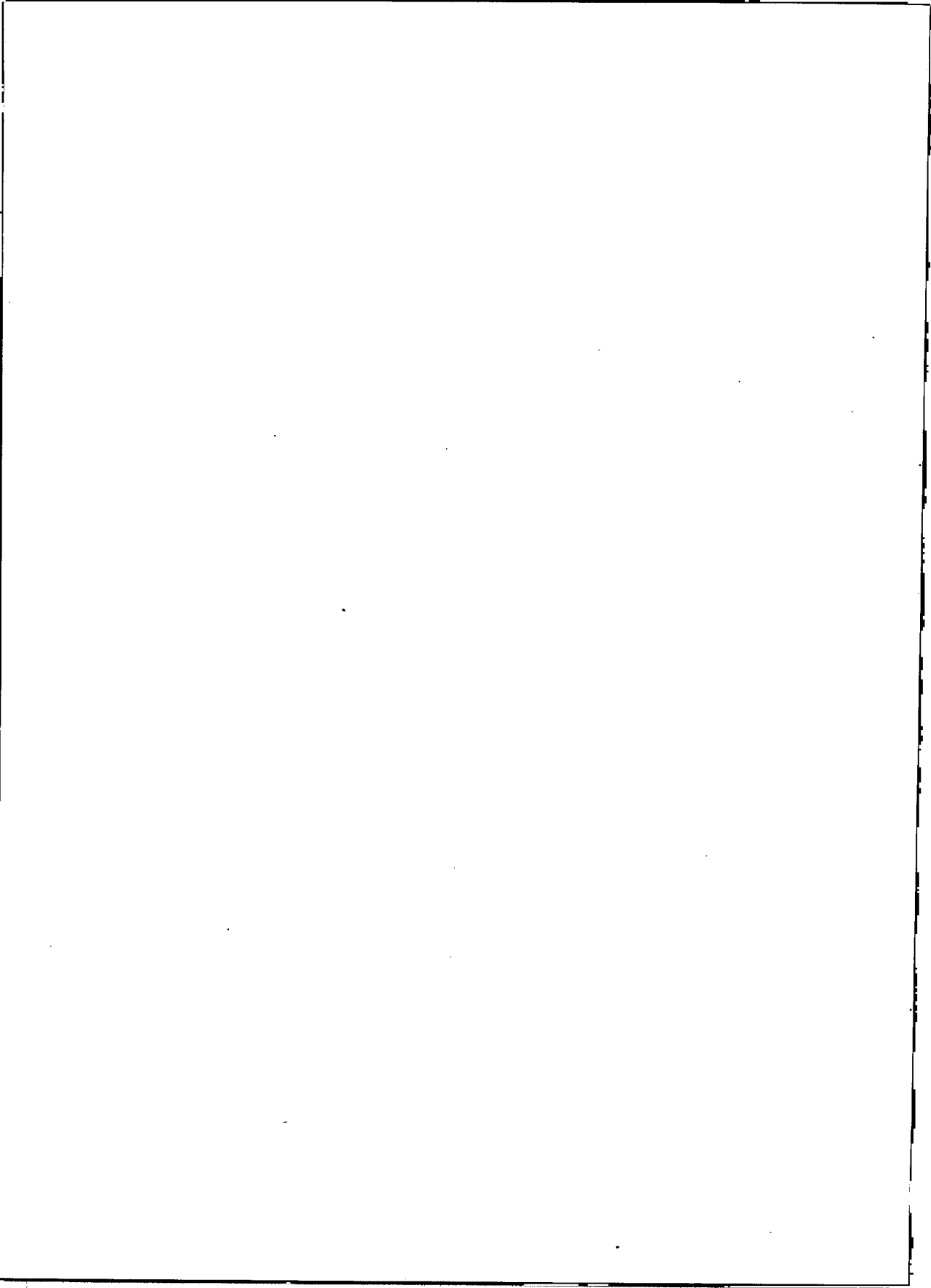
- 《楞伽经》刹那品中如来藏段梵汉对勘与新译 (237)
- 吉藏八不中道说辨正 (252)
- 《维摩诘经·入不二法门品》梵本新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259)
- 《维摩诘经·佛道品》梵本新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276)
- 阿毗达磨俱舍论第八品附录《关于补特伽罗之抉择》及称友
注释之新译 (299)

第四编 中国哲学思想研究

· 现代新儒家的佛教学缘	(385)
牟宗三《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说辨正	(398)
牟宗三对康德最高善说的呼应、批评与超克	(415)
略析《佛性与般若》在牟宗三哲学思想进展中的位置	(432)
从德、福关系的角度看儒、佛、道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作用	(445)
后记	(457)

第 一 编

明代佛教史研究



明代太监与佛教关系考述

——尤其以明代北京地区佛教为中心的考察

太监群体不仅是明代政治生活中一个相当活跃的重要群体，也是深刻影响过明代一般社会生活——包括当时人的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群体之一。明史学者较少措意太监群体的宗教信仰生活层面，即使是专门研究明代佛教史的学者，也尚少关注“太监与佛教的关系”这一课题之于理解明代佛教一般社会史的特殊意义。^① 本文将相关史料予以较为系统的整理，希望借此显示问题的整个轮廓，并试图从一个方面深化对明代佛教史的观察及理解。

由于明代太监群体大多数生活于北京地区，明代太监与佛教的关系，尤以北京地区表现得最为显著。故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时，也就特别要以明代北京地区的佛教作为考察的中心。

一 太监信仰佛教

信仰佛教，对佛教有特殊的浓厚的感情，这是明代太监群体信仰生活中的一个显著现象和事实。崇祯时期的刘若愚，在记录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太监生活与历史的著作《酌中志》中，有如下的表述：“中官最信因果，好

^① 陈垣先生所著《汤若望与木陈忞》（1938年）及《语录与顺治宫廷》（1939年）二文，提及清初名僧憨璞于顺治朝接交内臣事，对于本文的构思、写作，颇有启发。王春瑜、杜婉言合著的《明朝宦官》一书（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对于明代太监的佛教信仰问题略有提及。另外最近王春瑜先生主编的《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载有任昉女士的论文《北京地区新出明代宦官墓志零拾》一文，该文附录中收有三篇明代宦官墓志，提供了一些探讨本问题的最新材料。此外，笔者草成此文后，方拜读到何孝荣博士的《明代宦官与佛教》一文，文载《南开学报》2000年第1期。何氏文与拙文均对太监与明代佛教的关联问题予以郑重的关切。不过，何氏文似较集中于说明明代太监佛教信仰的原因及其影响，而拙文则尽量将思路克制于展示太监与明代佛教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借此种“现象学”式描述与清理的方式，以展示太监之信仰问题对于明代佛教社会史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①刘本人是内臣出身，长期生活于宫禁，他关于“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众”的记载，是切实可靠的。

明代内廷太监的佛教信仰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代初期。如明初著名太监郑和虽出生于回教家庭，但却信仰佛教。永乐十八年（1420），郑和捐财印造大藏经一藏，施于云南五华寺，据《五华寺大藏经发愿文》记载：“大明国奉佛信官太监郑和，法名福吉祥，谨发诚心施财命功，印造大藏尊经一藏，记六百三十五函，喜舍于云南五华寺，永远长生供养。”^②郑和一生“发心印造”的大藏经，就达“十一藏之多”。^③

在《明史·宦官传》中，可以找到一些反映太监佛教信仰问题的材料。如：“安（指兴安）佞佛，临歿，遗命舂骨为灰，以供浮屠”；“范弘，交趾人，……宣德初，……累迁司礼太监，偕英受免死诏，……（正统）十四年从征，歿于土木丧，归葬香山永安寺，弘建也”；“（王振）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④兴安、范弘在宣宗朝掌司礼监，王振在英宗朝掌司礼监，太监兴安在土木之变中，力阻廷臣迁都之议，劝谏郕王（即后之景泰帝）重用主战的于谦等人，于挽救因土木之变而导致的明朝危局颇有贡献；范弘在宣宗时同另一个太监金英一起曾获御赐免死诏，土木之变中从英宗战死；王振则是直接导致土木之变的权监。故三人在仁、宣、英、代时期的内廷中，是有

①（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22（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此条材料收录于《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③ 此据邓之诚先生《骨董琐记》所录明初刻本《优婆塞戒经》卷7后附刻郑和之题记，原文如下：“大明国奉佛信官内官监太监郑和，法名速南咤释，即福吉祥。切念生逢盛世，幸遇明时，谢天地覆载，日月照临，感皇上厚德，父母生成，累蒙世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尊经，舍入名山，流通诵读。伏愿皇图永久，帝道遐昌，凡奉命于四方，常叩恩于庇护。次翼身安心乐，福广寿长，忏除曩劫之愆，永享现生之福。出入起居，吉祥如意，四恩等报，三有齐资，法界群生，同成善果。今开陆续成造大藏尊经，计一十藏：大明宣德四年，岁次己酉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牛首山佛窟禅寺流通供养；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鸡鸣禅寺流通供养；大明宣德五年岁次庚戌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北京皇后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月十一日，奉施喜舍静海禅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十八年岁次庚子五月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镇江金山禅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十三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福建南山三峰塔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九年岁次辛卯仲冬吉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天界禅寺毗卢宝阁流通供养；大明永乐八年岁次庚寅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云南五华寺流通供养；大明永乐五年岁次丁亥三月十一日，发心印造大藏尊经一藏，奉施喜舍灵谷禅寺流通供养。”见于邓之诚著《骨董琐记》（中国书店，1991年）第593页。又关于郑和奉佛事迹的详细研究，可参看陈楠教授的论文：《三宝太监郑和奉佛事迹考》，文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6期。

④ 《明史》卷305《宦官传》（中华书局，1974年校勘本）。

代表地位的大太监。他们的信佛倾向，在当时的太监群体中，应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到了成化、弘治之世，内廷佛教信仰的发展十分迅速。《万历野获编》载：“成化十七年，传升道录司右至灵邓常恩为太常卿，时尹恭毅旻任太宰，不能执奏。又是年赐番僧万行清修真如自在广善普慈宏度妙应掌教翊国正觉大济法王、西天圆智大慈悲佛领占竺等十四人诰命，时周文安洪谟为宗伯，亦不闻执奏也。盖宪宗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如此。后孝宗登极，夺常恩官，正其罪，领占竺者亦降号国师，遣归四川之彭县光相寺住坐。未几，即遣内官召还，令驰驿来京。言官屡谏屡止。至十五年又召之来，命居大慈恩寺。盖此时道教置不谈，而佛氏为中官及大珰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也。”^① 宪宗朝“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孝宗朝道教受挫，佛教则“为中官及大珰所信向”，乃至孝宗也无可如何。《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是万历、天启间人，他所记成化、弘治间内廷佛教信仰的走向，应属有据。

又《明史·宦官传》之《怀恩传》，附记太监覃吉事：“有覃吉者，不知所由进，以老奄侍太子，太子年九岁，吉口授《四书章句》，及古今政典。……太子偶从内侍读佛经，吉入，太子惊曰：‘老伴来矣。’亟手《孝经》。吉跪曰：‘太子诵佛书乎？’曰：‘无有，《孝经》耳。’吉顿首曰：‘甚善，佛书诞，不可信也。’弘治之世，政治醇美，君德清明，端本正始，吉有力焉。”^② 覃吉虽以为“佛书诞，不可信”，禁太子（孝宗）读之，然太子背着覃吉，则“从内侍读佛经”。这条材料也可反证，至成化、弘治之世，佛教在内廷太监中，已是相当普遍的信仰了。

万历初年，大太监冯保亦造双林寺，营建葬地：“万历初，大珰冯保营葬地，造寺曰双林。双林，冯之别字也。”^③ 在冯保之后，“张太监宏，继冯掌印，宏墓在阜成门外迎祥寺侧”^④。又“张鲸，北直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选入，为宏名下。神庙倚毗之后，掌东厂兼内府供用库印，颇为时相所惮。至戊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侧”^⑤。又“戊戌春，孙暹卒，葬西山碧云寺。暹，北直涿州人，魏忠贤之本宫也”^⑥。又“先监陈公讳矩，号麟冈，北直安肃县人。万历十一年籍没太监冯保时，已任典簿，后升监官。至十九年春，代

①（明）沈德符撰：《万历野获编》卷27“释道”，《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明史》卷305《宦官传》。

③（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7引《穀城山房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④（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5。

⑤ 同上。

⑥ 同上。

藩奉国将军廷堂有罪，革爵禁锢凤阳高墙，先监奉敕押发。沿途廉静宽恬，驿递感悦，皆以佛称之。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时，在内直房端坐以逝。特传造立棺，如僧家葬法，以无涇中正乐善，令终之美云”^①。又“丁未冬，先监坐化，而继掌司礼监印者，成敬也。成卒于庚戌秋，葬于迎祥寺后”^②。又“魏忠贤，原名李进忠，直隶肃宁县亡赖子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门外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桥之僧愈光法名大谦者，乃贤所礼之名衲也”^③。

张宏、张鲸、孙暹、陈矩、成敬、魏忠贤等，或掌司礼监印，或提督东厂，或兼掌司礼监、东厂。上列诸“大珰”人品格调差异甚大，如其中有深受后世敬重的张宏、陈矩等人，也有人人唾弃的魏忠贤之辈，其信佛原委也各不相同。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佛、重僧、建寺，死后必葬佛寺。从他们身上可以强烈感受到明代中后期内廷太监佛教信仰的浓厚与普遍。

二 太监与藏、汉名僧的宣召、抚问

（一）太监与乌斯藏僧的宣召

招徕、宣抚乌斯藏僧，借佛教的信仰力量来加强汉、藏两地的沟通和联系，是明朝太祖、成祖制订的一项重要国策。此项国策的要点，即是“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④，故而宣召乌斯藏僧乃是当务之急。明初诸帝往往将宣召之任，托之于太监。

这里举《明史·宦官传》的三例：“侯显者，司礼少监。帝闻乌斯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幻化，欲致一见，因通迤西诸番。乃命显赍书、币往迓。选壮士、健马护行。元年四月奉使陆行数万里，王四年十二月，始与其僧偕来。显以奉使劳，擢太监。”又，“宣德二年二月，复使显赐诸番，遍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诸国而还。适遇寇劫，督将士力战，多所斩获，还朝录功，升赏者四百六十余人。显有才辩，强力敢任，五使绝域，劳绩与郑和亚”。“又有刘允者，以正德十年奉敕往迎乌斯藏僧，所资金宝以百余万计，廷臣交章谏，不听。允至成都，治装岁余，费又数十万，公私匱竭。既至，为番所袭，允走免，将士死者数百人，尽亡其所资。及归，武帝已崩，世宗用御

①（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7。

②（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5。

③（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14。

④《明史》卷331《西域传》。

史王钧等言，张忠、吴德发孝陵卫充军，张雄、张锐下部察院鞠治，允亦得罪。”^①

永乐元年至永乐四年，司礼少监侯显奉成祖命，使乌斯藏，宣诏尚师哈立麻；宣德二年，宣宗命太监侯显再使乌斯藏等地；正德十年，太监刘允奉武宗之命，往迎乌斯藏僧。这是明代前期太监出使西藏、招抚藏僧的三个著名事例。

关于宣召藏地高僧一事，《明史·西域传》的记载，比《宦官传》的材料详细：“乌斯藏……有僧哈立麻者，国人以其有道术，称之为尚师。……永乐元年，命司礼少监侯显、僧智光赍书、币往征。其僧先遣人来贡，而躬随使者入朝。四年冬将至，命驸马都尉沐昕往迎之。……遂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六年四月辞归，复赐金币、佛像，命中官护行。”“大乘法王者，乌斯藏僧昆泽思巴也。其徒亦称为尚师。永乐时成祖既封哈立麻，又闻昆泽思巴有道术，命中官赍玺书银币征之。其僧先遣人贡舍利、佛像，遂偕使者入朝。十一年二月至京，帝即延见，……封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礼之亚于大宝法王。明年辞归，赐加于前，命中官护行。后数入贡，帝亦先后命中官乔来喜、杨三保赍赐佛像、法器、袈裟、禅衣、绒锦、彩币诸物。”“大慈法王名释迦也失，亦乌斯藏僧称为尚师者也。……释迦也失亦以十二年入朝，礼亚大乘法王。明年命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赐之印诰。……十七年，命中官杨三保赍佛像、衣币往赐。……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师，命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自在大圆通佛。”“阐化王者，乌斯藏僧也。……永乐元年，遣使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十一年，中官杨三保使乌斯藏还，其王遣从子割结等随之入贡。明

① 以上材料散见于《明史》卷305《宦官传》。明廷之通西番诸地，太监侯显实有功焉。关于侯显之身世、籍贯，《明史》无所记载，而藏史一类的材料如《安多政教史》等典籍，则记显为洮州藏族。吴均先生在《论明时洮岷地位与洮岷三杰》一文中，曾考订此问题如下：一、侯显是洮州人；二、侯显是藏族；三、侯显告老回到洮州，还有“汉官”护送；四、他死后遗骨筑有灵塔；五、侯显迎大慈法王时，曾筑圆成寺，该寺名即是藏语史籍中所谓的“叶尔哇寺”。吴氏且称：“据藏文《宗喀巴大传》等所述，侯显是明廷先后两次派去迎请宗喀巴大师的使者，他主要的贡献则是沟通、加强藏区与明中央政府的直接联系。他是洮岷藏族子弟最早参加在中央政府内廷的人物，而洮岷地区的藏族子弟能和云南回族子弟郑和一样能参加内廷工作，就此一点我们不能不再次看到明洪武朱元璋令少数民族故元降官‘皆带刀侍卫’之坦荡胸襟与其在民族关系上不存畛域之伟大政治艺术的成就。”吴均先生论文载于《藏学研究论丛》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引文见该书第71页。

年，复命三保使其地。……其后贡益频数，帝嘉其诚，复命三保赍佛像、法器、袈裟、禅衣及绒锦、彩币往劳之。已又命中官戴兴往赐彩币。宣德二年，命中官侯显往赐绒锦、彩币。”“赞善王者，灵藏僧也。四年，其僧著思巴儿监藏遣使人贡，命为灌顶大国师，明年封赞善王，国师如故。赐金印、诰命。十七年，中官杨三保往使。……宣德二年，中官侯显往使。”“阐教王者，必力工瓦僧也。……十一年，乃加号灌顶慈慧净戒大国师，又封其僧领真巴儿吉监藏为阐教王。……杨三保、戴兴、侯显之使，皆赍金币、佛像、法器赐焉。”“辅教王者，思达藏僧也。其地视乌斯藏尤远。……永乐十一年封其僧南渴烈思巴为辅教王，杨三保、侯显皆往赐其国，与诸法王等。”^①

从永乐朝到宣德朝，朝廷在乌斯藏地区共封八王，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八王之宣召、往赐、护送、抚问等诸事，大部皆由太监主持之。参与其事的太监，除侯显、刘允以外，尚有乔来喜、杨三保、戴兴等人。明初宣召乌斯藏僧，就朝廷而言，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侯显、杨三保等太监之努力，于斯事之成甚有功焉。至武宗所遣太监刘允从西藏铄羽而还，此固与刘允个人之不善其事甚有关系，但内中之主因，实由于宣德、正德间国势之隆替矣。

（二）太监与汉地名僧的宣召、抚问

乌斯藏僧以外，又有汉地名僧的宣召。明初鉴于元代佛教之冒滥，致力建立与专制集权相适应的僧官制度，^②对僧团之发展、僧人之行为、出家之规定等等，都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总的说来，在对佛教之发展施以节制及管束的基础上，注意发挥佛教对于翊助王化的作用及职能，仍是明代佛教政策的基点。^③明代帝王常常征召各地高僧大德，既备咨询、顾问，又示对佛教之珍重礼遇。而帝王宣召名僧，及与其酬答、问讯等任务，自然也就交给太监来完成。

这里稽举数例。如明初名僧智光之例：“师性行纯简，朝廷凡命修建大斋，惟诚惟恪，每入对，惟以利济万有为说。仁宗所赐仪仗出入，屏不用。上知之，遣中贵人问故，对以平生但持经戒，非有汗马之劳，宠锡所临，谨受藏

① 《明史》卷331《西域传》。

② 参见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③ 关于明初佛教政策的基本模式问题，周齐女士在所著论文《明代佛教政策的基本模式》一文中，有翔实而贴切的分析，此处的论说颇参稽其说。周文载于《佛教与历史文化》一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

之足矣，用之岂不过耶。”^① 智光曾奉高祖之命，两使“西域”。永乐初年内官侯显出使乌斯藏，智光亦与其事。因其劳绩，仁宗曾特赐以“仪仗”。这里明仁宗遣使“问故”的“中贵人”，即是一位太监。

再如高僧慧进之例：“慧进，……志慕出家，礼邑元大云寺渐公落发执经，由洪武新恩得度，入汴，依古峰究通《华严》宗旨，傍达《唯识》、《百法》诸论，意解心融，众所钦服，遂得法主之称。太宗皇帝知之，遣中官驰驿召至南京，备问《楞严》大义，应对称旨，赐紫衣，命住天界寺，选俊秀僧徒从学。”^② 慧进是元末明初一位义解高僧，精于《华严》、《唯识》、《百法》、《楞严》等经论。成祖遣“中官”将他召至南京，以备顾问。后来这位慧进法师随成祖至北京，被诏“领袖天下僧众”。慧进还是最早向成祖建议刊行藏经的人之一。

再如高僧能义之例：“能义字无言，别号损庵，……仁宗皇帝在青宫，拟师补其处，令入朝，上见师道容，喜甚，除僧录左觉义，赐锦衣一袭，貉裘、暖帽、靴袜，并钞二百锭，遣中官送回南京，于钟山第一禅林举唱宗乘，缙素悦服。未几复入朝，升左讲经，寓庆寿寺。疾作，上闻，赐医药，中使相望于道。”^③ 能义也是元末明初的义学高僧，以精于《楞严经》著称。能义去世之前，仁宗皇帝不断派出“中使”，探望能义的病情。这些“中使”，也即是太监。

还可举出天泉祖渊的例子：“（祖渊死）太上皇闻之，遣太监吴弼赐以白金，香币，钞万缗。”^④ 天泉祖渊是明宣德、正统年间的一位律学宗师。他在宣德年间曾住持京师大功德寺，正统中并担任过万寿戒坛的传戒宗师。祖渊死时，明英宗遣太监吴弼慰问，上引材料中的“太上皇”，指英宗皇帝。

宣召、抚问藏、汉名僧，从明初至正德年间，都是朝廷一项重要的国事活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太监参与了这项活动的始终。这使得生活在内廷的太监，有机会深入接触当时第一流的僧人。明代内廷太监群体普遍的佛教信仰，与太监承担宣召藏、汉名僧的特殊任务，当不无关系。

①（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西天国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卮字绩藏》本。

②（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4《慧进传》。

③（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5《能义传》。

④（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8《天泉渊公传》。

三 太监与内廷佛事活动

明代内廷又设有汉经、番经二厂，例设若干员内官，备皇室佛事活动的需要。

刘若愚记汉经厂事如下：“皇城內旧设汉经厂，内臣若干员。每遇收选官人，则拨数十名念习释氏经忏，其持戒与否，则听人自便。如遇万寿圣节，正旦、中元等节，于宫中启建道场，遣内大臣瞻礼，扬幡挂榜，如外之应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缁衣，亦与僧人同。惟不落发耳。圆满事毕，仍各易内臣服色。”^①又记番经厂事如下：“番经厂习念西方梵呗经咒，宫中英华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陈设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钦安殿香火，亦各有司也。凡做好事，则悬挂幡榜。本厂内官皆戴番僧帽，穿红袍，黄领黄护腰，一永日或三昼夜圆满。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虽在英华殿，然地方狭隘，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妆韦陀像，合掌捧杵，向北立者一人，御马监等衙门牵活牛黑犬围侍者十余人。而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被纓络。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椎，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②

汉经厂内官，平时习释氏经忏。番经厂内官，平时习“西方梵呗经咒”。遇到帝王诞辰，正旦、中元等节，两经厂内官则于内廷置办道场，做法事，其仪规、作法与汉僧、番僧的专业佛事活动，几无二致。由于大内除皇室成员、太监、宫女以外，一般严禁外人出入，而宫廷内庆寿、祝禳一类的佛事活动，在当时又事属必须，这就使得番经厂、汉经厂的设置，成为内廷必不可少之事。与此相应，一部分内官也就成为专事内廷佛事活动的准职业僧侣。

明代内廷中专事宗教活动的机构，番经厂、汉经厂以外，尚有“演习玄教诸品经忏”^③的道经厂。刘若愚记万历时三厂举办法事的具体程序如下：“凡做好事一昼夜，或七昼夜，各有钦赏钱锭为标，一总事毕，易服叩头谢恩。凡三经厂将做好事之前，须先颁旨意，传各衙门答应钱粮。其所诵经卷，所费纸割，司礼监也。桌凳、香炉等件，内官监也。铃杵等件，御用监也。

①（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之16。

② 同上。

③ 同上。